

导 言

—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仍然困扰着人类甚至可以说越来越困扰人类的现实问题。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经济便已为人类所必需，因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事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同样，从人类诞生以来，道德也为人类所必需，因为人类一旦诞生即意味着社会的生成，而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本手段之一，同时，道德是人的道德，无道德即非人。可见，经济和道德与人类是相依不离的。然而，人类却总是被自身所必需的经济和必需的道德所困扰，甚至所压迫、所扭曲。不仅如此，经济与道德所必然结成的关系也往往使人类处于二难选择之中，这种关系即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律背反。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推动了道德的进步，但它往往又被人们认定为是导致道德堕落的罪魁祸首，经济似乎注定就充当着双面人雅努斯的角色。经济和道德的这种关系使人

类从诞生以来就处于一种难堪和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人类发生阶级分化以来就更是如此。十分遗憾和可悲的是，这一状况在现代社会已愈加突出，以致随着人类反思意识的不断增强而被渲染成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的问题。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关注和面对的共同问题，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已成为现代人的中心话语。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还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双向展开，即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而言，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日趋健康的，并因此而不断推动道德的进步；道德应该是不断进步的，并因此反过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在这里理论总是过于理想化，因而显得很苍白，现实生活则似乎生动地表明，经济的发展往往是健康与病态相伴行，道德的进步往往与退步相交织，现实生活总是不听理论家的劝谕，它执著地以经济病态为代价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以道德的退步为代价推动道德的整体进步，甚至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和某些环节上使经济的健康发展与道德的整体进步背道而驰，或者换句话说，使经济的病态发展与道德的堕落和退步并驾齐驱。对于这种历史状况，理论似乎束手无策，而实践则不管理论是否有所作为，总是并不理想地甚至很不理想地顽强前行，——要知道，如果要等理论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才去行动，那么历史必然永远停留在原点上。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悲观。理论和理论家们毕竟是有所作为的。消除经济与道德的不协调状态，构架一种理想化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正是人类思想理论家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既以经济又以道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们（试问，只讨论经济而不讨论道德的经济学家或只讨论道德而不讨论

经济的伦理学家，历史上有几许？）必须且必然要创立关于经济和道德关系问题的理论，也就是说，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单纯地以经济学方法或伦理学方法，或把它看作仅仅是经济学问题或伦理学问题，都不可能完全充分地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和人类反思意识的日益增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已必需一种叫做“经济伦理学”的新学科来加以探讨和研究了。可以说，对经济活动的伦理审视和对道德价值之经济学底蕴的揭示，是人类文明史上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携手耕耘的共同领地。虽然有经济学家声称伦理学不应干预经济学，也有伦理学家坚持伦理学只以道德为对象而与经济学无关，但他们的声明和努力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和意向而已。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既作为历史问题，又作为现实问题；既作为经济学问题，又作为伦理学问题，是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主观理念中一切问题的交汇点和聚焦点，正因为这样，它才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也才成为人类的难点问题之一。

二

人们感到基本满意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从宏观上看，经济总是发展的。虽然即使在现代，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处于十分贫穷的状况，在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线（相对而言）以下，在历史进程的某个阶段也会出现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但是，就整个人类的角度而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这即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经济必然性”。

那么，经济发展究竟何指？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回答的，即经济发展主要就是指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较前有所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增加，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等等。用这些指标去衡量经济是否发展，一般而言是不会出现误评的，而且经济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可直感的。

经济发展的必然性首先是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人类的最基本、最低层次因而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就是生存需要，而维持人类生存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因素，或者说人类生存需要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物质需要。在人类生存需要的最低层次上，主要表现为果腹御寒的需要。需要必然导致行动，为了果腹和御寒，就必须从事必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因此，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就必然推动经济发展。然而，仅仅生存是远远不够的。活下去固然十分重要，但人类要追求活得更好。于是，人类除了生存需要之外，还必须具有发展需要。在生存需要基础上的一切需要均可视为发展需要。当然，发展需要本身也是分层次的。发展需要是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为了过得更好、活得更好的需要。人类对过得更好、活得更好的追求无止境，人类的发展需要无止境，为此而激发的人类的创造力也无无止境，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止境。正是这样的发展需要，决定了经济必然是发展的。人类一旦有了某种需要，就会比一百所大学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还表现在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相互推进和相互需要。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济和科学技术竞相增

长，这是因为，人类对经济的需要和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实质上是同一种需要，不仅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同样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不仅如此，经济和科学技术也是相互需要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相互需要和相互推进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遏制的过程，不可想象可以通过经济的力量阻抑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可想象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经济停滞不前。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同时萎缩和同时勃发是一条规律，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必定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反之亦然。

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思想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按照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道德和经济的关系时，反复强调：第一，道德的根本基础和道德观念的最终源泉是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状况，“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1 页。

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总的来说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性归根到底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你划出曲线中的中轴线，你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③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道德的进步就像其他一切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一样，并不是机械地受制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只是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决定着道德的变化，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上的需要，它确切地适应着社会的实际需要”^④，只是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而言的。我们从现象的层面经常看到的，倒恰恰是道德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呈反方向运动，或用人们常用的话说，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是二律背反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这似乎被历史进程尤其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道德关系的状况所证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滑坡论”者的主要观点。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论好像是对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存在决定论的反叛，而实际上是对经济和道德关系复杂性和辩证性的肯定和揭示。

我们已经指出，经济发展的含义和指标是较易规定的，但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8页。

于道德进步究竟何所指，实际上并无明确的规定，而恰恰在这里，人们莫衷一是，感性议论有余而理性思考不足。譬如，对于下述一些问题，人们基本上还未触及，即道德进步究竟是指道德在数量上的增加，还是道德在质上的突破？而质的突破又如何衡量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道德进步究竟是体现在道德理论的完善和更新上，还是体现在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的提升上？要讨论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究竟是否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必须以回答上述问题为前提。

道德的进步，当然应该包含着道德在数量上的增长，这不仅是指人们的道德知识不断增加，道德认识水平不断提高，道德范畴不断增多，而且是指人们道德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总之，今天的人们在道德知识和实践的总量上已是远非我们的祖先可比拟的了。这毫无疑问标志着道德进步了。但是，道德知识和实践的量的变化，并不能根本解释道德之是否进步的问题，也无法解释经济发展了，道德是否就一定进步的问题。道德在量上的增加，只表明先人奠定的基本道德在以后发扬光大了，并不表明今天发扬光大了的道德就一定比原来的道德进步和先进。有人正是基于此而认为，摩西十戒和孔教五伦，“是圣人所定教义的大纲领，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自古以来，虽然盛德的士君子辈出，但对于这个大纲领只不过是加以注释，并未能另外增加一项。宋儒著作虽多，也未能变五伦为六伦，这就是道德条目简少而永不移易的明证。……关于道德问题，好像是古人独占了专利权，后人只能为承销商，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和孔子以后没出圣人的缘故。所以道德后来一直没有改进，上古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道德问题自古

以来就是固定不变的”。^① 可见，仅从量上来看道德是否进步，最终必然得出道德固定不变、道德没有进步的结论。

因此，不能仅从量上来看道德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看道德在质上的变化。阶级道德与非阶级道德的分野，这个阶级的道德与那个阶级的道德的对立，就表明了道德在质上的区别；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制度与体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道德体系，这就要求原有的道德必须进行质的突破，同时必然会产生原来不曾有过的新的道德。问题在于，取代旧道德的新道德难道一定是先进和进步的吗？毫无疑问，在这里，取代旧道德的新道德既可能是进步的、先进的，也可能是退步的、保守的。那么，衡量新的道德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标准既非经济发展的标准，也非道德本身的标准，而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标准。

道德进步问题除了量和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道德进步究竟是指道德理论学说的完善和更新，还是指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的提升？

道德进步与道德理论学说的完善和更新有一定联系，即道德理论和学说是以道德状况本身（其中包含着道德进步）为对象的，诸种道德理论或者是对道德现象的经验描述，或者是对道德概念和判断的研究，或者是对道德行为规范及其标准的设定。上述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分别形成了描述伦理学、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等理论形态，而这些理论形态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分支理论或思想流派。它们是随着人类道德实践内

^①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81～82 页。

容和形式的不断变化而演变的，是对道德现象和道德活动的反映和把握。但是，不管怎么说，道德理论和学说毕竟不是道德本身，它的演变和发展并不能构成道德进步与否的根据。

真正作为判断道德进步与否的根据的，应该是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本身。一个道德理论十分完善的社会，并不一定是道德水平很高的社会；甚至还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道德问题，道德理论才得到大的发展。因此，道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并不是道德进步的表征。只有人们的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才能真正体现道德的进步与退步、先进与保守、光大与沦丧。也只有人们的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才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最密切地相互关联。

总之，道德进步与否，虽然也体现在量的增减上，但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质的突破上；虽然在道德理论和学说中也得到反映和体现，但更根本的是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中。然而，恰恰在这里，由于没有作如上深入而辩证的解析，人们总把道德从原始社会一般的风俗和意识中分化发展为社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体系，把道德的知识内容日益加深和伦理学说的发展，看作是道德进步的主要标志，这正好忽视了道德的质的突破和实际道德生活、道德实践对道德的变化所具有的更深刻的意义。须知，道德在量上的增加、道德知识的丰富、道德理论体系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实际道德水平的提高，一个道德知识很丰富、道德意识很强的人，并不一定是道德水平很高、道德行为良好的人。因此，我们讨论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关系时，主要是看经济发展与具有新质的道德、与人们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而不是看经济发展与道德在量上的增减和道德理论学说的关系。

四

恩格斯指出：“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①对此，应作两点说明：第一，在这里，恩格斯所指的“道德”是作为“人类的知识”的一个部门，即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来看的，这种作为知识形态的道德主要就是指的道德理论和学说，以及对道德认识之结晶的道德知识。这些道德认识的成果，在历史上无疑是不断累积、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因而总的来说是进步的。第二，从人类的实际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来看，总的来说也是进步的，因为经济的发展迟早要带动和推动道德的进步；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研究的时期拉长、研究的范围扩大，就会发现，道德发展的轴线愈来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并跟经济发展的轴线平行而进。

然而，恩格斯也深刻地洞察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二重性，指出，“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在阶级社会里，“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②。道德的发展尤其体现了这种进步与退步相交织、善与恶相斗争的辩证法，正如有人指出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善同恶是携手前进的，进步本身是幸福和灾难的结合，也就是说，是一个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

的现象'^①。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否认和不可抹煞的联系。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大发展和道德大堕落同时出现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思想家们对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反思和艰苦的求索，并以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来概括这种现象。

所谓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通俗地讲，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或者说，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相反，却带来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甚至导致道德的“堕落”和“沦丧”，从而使人们陷入深深的道德困境。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的主要表现，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 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富足，与道德生活水平的提高，二者不可得兼。按理说，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富足，应该使道德得以提升，使人过上更幸福和更道德的生活。然而事实总是与愿望相违。正如 19 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所说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与人们所希望和想象的应该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相去太远，“由于这些丰盈的物质条件，他会看到（根据必然的循序）实现了它的黄金时代的日益上升的道德状态，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青年人不再发育不全成为饿殍；老年人不再为贪婪所折磨；孩子与老虎在一起玩耍；拿粪耙的人在辉煌的灯光中饮酒；丑恶的东西消失了，凶猛的东西驯服了；倾轧转变为和谐！在所有人丰足的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贪婪呢？在贫困销声匿迹的地方，由贫困和惧怕贫困而产生的邪恶、

^① [苏]捷·奥伊则尔曼主编：《十四—十六世纪辩证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3～234 页。

犯罪、无知、残酷怎么可能存在呢？在所有人都是自由人的地方谁还会低头弯腰，在人人平等的地方谁还能压迫别人？”然而，这种“应该”式的愿望只是“人们的希望”，只是“美梦”而已，“事实是无数次的失望”^①。物质进步不但没有阻止道德堕落，反而促成和加速了道德的堕落。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们更是对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道德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关注和反省。

2. 类的发展总以个体的牺牲为前提。马克思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考察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性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②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③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经济的发展对于“种族”和“全人类”即“类”的发展而言是有利的，它符合类的整体利益，但不一定有利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不一定符合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和满足每一个个体的需要，相反，类的利益的实现往往要以牺牲个体的利益为前提；因此，第二，为了类的发展和利益，个体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牺牲自己以求得类的发展。乍看起来，这对个体而言是不公平、不合理和不道德的，但是，这又恰恰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公平、合理和道德得以实现的环节。当然，个体牺牲的程度，从总的趋势来

① [美]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2～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第 124～12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7 页。

看，是与社会的进步和发达程度成反比的，即社会越是进步和发达，其满足个体需要的能力也就越强，要求个体作出牺牲的程度也就越低；而越是落后越是不发达的社会，满足个体需要的能力也就越弱，要求个体作出牺牲的程度也就越高。类的发展以个体牺牲为前提，深层次地反映了经济的发展（这是社会和类发展的基础）总要以牺牲个体的发展（这些牺牲应该包括物质上的、精神上的、道德上的）为前提，个体在类的发展面前变得渺小和不重要起来。个体和类的这种矛盾发展是历史事实，尽管这一事实并不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类的发展以牺牲个体为前提，肯定了类的发展的道德价值，而使个体的道德价值趋向失落。

3. 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还表现在文明社会中科技与道德的相悖和对立。我们已经指出，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是一体两面的，因此，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必然表现为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在西方，科学理性传统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科学崇拜，但反科学观念虽不占主流，却也由来已久，与唯科学主义并行而进。从奥维德的诗歌，到柏拉图“黄金时代”的空想；从霍勒斯“火与船”的悲歌，到卢梭的“爱弥儿”，都包含有对科学技术的忧患意识。反科学观念和冲动是以科学技术妨碍人性和道德这一特定理解为契机的。卢梭指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天边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①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一些文化哲学家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文明堕落、道德沦丧的祸根。汤因比曾高度概括了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历史表现，他说：“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提高。所以，在道

^①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7 页。

德上说文明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出一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跟过去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社会相比，跟至今仍保持着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相比，也没有任何提高。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还有使用非人格的力量的提高。这跟道德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①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时也尖锐地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②。而在中国历史上，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恰与西方呈反方向运动，即以封建纲常伦理压制科技的发展，以为“奇技淫巧”必然损害道德人心，二者必不可得兼。在存在着奴役、剥削和阶级对立的文明时代，科技与道德往往处于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状态之中：封建社会经常以其落后腐朽的伦理道德抹杀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但与此相伴的则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卑劣的贪欲”等等所导致的道德危机。

必须指出，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在历史上尽管反复出现，但不能因此而抹煞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正相关关系，因为经济发展或迟或早是要推动道德进步的；也不能把某些道德品质的失却等同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和堕落；同样，不能把某一时期、某一阶级或某些人的道德堕落等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和社会整体的道德堕落；更不能以道德复古主义和道德乌托邦来衡量现实的道德水平，从而把道德和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我们不能把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普遍化和绝对化。

^①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3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7 页。

五

导致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原因究竟何在？由于道德对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及其所固有的文化价值，“道德”往往被人们当作经济发展的受害者；一般而言，人们不会把道德看作是妨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是把它看作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既然如此，人们自然地就会把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原因归罪为经济发展，总是去“反思”、“反省”、“批判”经济的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对道德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而导致经济每发展一步而人们对经济发展的“忧患”则增强一分，导致人们希望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是人自身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而又惧怕经济发展（因为人们总是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堕落）的尴尬心态和矛盾心情。人们在这种矛盾情结中不能自拔。经济本身成为攻击对象，对于经济是不公平的。把道德堕落甚至把人类的一切缺陷都一古脑地推给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事实上是对经济和科技的敌视和恐惧。我甚至不同意所谓“经济”是一把双刃剑的说法，把经济说成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人自身不敢承担责任的遁词。所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在我看来即是由社会主体、经济主体即人造成的，而不是由经济本身造成的。经济（包括科技）发展本身只会给人带来好处，只会不断给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前提，只会不断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享受。所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诸如引发道德堕落、增添人的烦恼、导致人

性异化等等,都是由“物欲”“钱欲”“情欲”等交织成的“人欲”的不合理、不正当的膨胀即贪欲造成的,而贪欲是过分之欲望,是“超经济”地对经济的过分榨取和预支的结果。在马克思·韦伯看来,贪欲是人类普遍之欲,“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①。当然,对“人欲”,我们并不是要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棍子打死,而是还要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可以说,人的欲望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顾道德的约束,使人们面对经济和道德处于二难选择之中。人的欲望(即“恶”)的这种两面性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深刻阐述。黑格尔不相信那些爱心、仁义、德性和情操的空话,而认为“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由自私欲望产生的冲动,“比起维护秩序和自制,法律和道德的人为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于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②。这种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

^①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41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页。

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① 人的欲望的两面性正是导致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原因之一。

导致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另一原因是目标选择的不一致。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由诸多子目标系统构成的。社会目标即是社会应当发展成什么样的社会的一种指向或标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子目标就是经济和道德目标，这两个目标的价值定位或价值取向往往不一致甚至矛盾，这种状况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缺憾和难以两全其美。从主观愿望而言，“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什么也买不到；我们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有效率的、富裕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把它的金钱用于道德上受到指责的目的”^②。然而人们感到不满的是，人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而难以自拔。科斯洛夫斯基指出：“经济学作为对为了已知目标所进行的资源的正确分配的思考可以给出如下问题的答案，即在怎样的规模上，用多少有用成本可以实现目标，但是，按照奈特的看法，经济学‘永远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即是否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相矛盾，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一个目标又是可以牺牲的’。在遇到相互竞争的目标产生冲突时，我们就必须放弃‘科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② [德] 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